

主编 张大可 丁德科

【第十七卷】

史記論著集成

(全二十卷)



见右页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史記論著集成

(全二十卷)

主编 张大可 丁德科

【第十七卷】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创于1897 2015年·北京

《史记论著集成》丛书（1—20卷）

丛书编委会

主编 张大可 丁德科
编委 赵生群 张新科 张 强
俞樟华 田志勇 陈 曜
凌朝栋 王亚玲 王炳社
曹 强 梁建邦 马雅琴

主创作者（主编以下按丛书卷次为序）

张大可 丁德科 韩兆琦
宋嗣廉 梁燕玲 凌朝栋
曹 强 梁建邦 王亚玲
杨燕起 陈可青 赖长扬
王明信 可永雪 阎崇东
俞樟华 赵生群 韦爱萍
张玉春 应三玉 张新科
王晓红 王麦巧 马雅琴
梁红仙 袁 梁 王炳社
詹歆睿 王双喜 许盘清

参编作者与收录作者详各分卷

《史记论著集成》丛书（1—20卷）

丛书目录

- 第一卷 司马迁评传 张大可 著
- 第二卷 史记题评与咏史记人物诗 韩兆琦 张大可 宋嗣廉
梁燕玲 编著
- 第三卷 史记学概要 张大可 凌朝栋 曹 强 著
- 第四卷 史记论赞与世情研究 张大可 梁建邦 著
- 第五卷 史记精言妙语 张大可 辑释
- 第六卷 史记集评 杨燕起 陈可青 赖长扬 汇辑
- 第七卷 史记人物与事件 王明信 可永雪 编著
- 第八卷 史记史学研究 阎崇东 著
- 第九卷 史记文学研究 可永雪 著
- 第十卷 司马迁思想研究 王明信 俞樟华 著
- 第十一卷 史记文献与编纂学研究 张大可 赵生群 等著
- 第十二卷 史记版本及三家注研究 张玉春 应三玉 著
- 第十三卷 史记研究史及史记研究家 张新科 俞樟华 等著
- 第十四卷 史记疑案研究 王晓红 王麦巧 选编
- 第十五卷 历代史记论文粹编 马雅琴 梁红仙 袁 梁 选编
- 第十六卷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名栏论文粹编（上） 王炳社
詹歆睿 王双喜 选编
- 第十七卷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名栏论文粹编（下） 王炳社
詹歆睿 王双喜 选编
- 第十八卷 从《老子》到《史记》一统思想论稿 丁德科 著
- 第十九卷 史记地名汇释表 许盘清 编著
- 第二十卷 史记论著提要与论文索引 张大可 俞樟华 梁建邦 编

渭南师范学院重点学科建设重大项目
史记论著集成（全二十卷）

• 第十七卷 •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名栏论文粹编（下）

王炳社 詹歆睿 王双喜 选编



2015年·北京

内 容 提 要

作为司马迁故里、陕西东大门唯一的本科高校，渭南师范学院多年来坚持培育史记研究学术团队，打造科学研究优势与特色，已成为国内史记研究的重镇。《渭南师范学院学报》依托司马迁故里的地域优势和学校史记研究的学科优势，自 1989 年起开始设立“司马迁与《史记》研究”栏目，至 2014 年 7 月，连续设栏 26 年 105 期，发表文章 301 篇，是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栏建设栏目。多年的坚持开办，该栏目培养了一批较有影响的核心作者群，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影响，大大促进了史记学术队伍的壮大和史记研究的发展，所发文章对陕西省政协、渭南市人大、渭南市政协代表形成关于地方经济文化的议题、提案发挥了建设性作用。本书是从该栏目已发表的文章中精选出的 100 篇优秀论文，总字数 90 余万字，分为上、下两卷，编列入《史记论著集成》为第十六、第十七卷。本书为第十七卷。每卷选文各 50 篇，所选文章主要涉及司马迁思想研究、《史记》文本研究、《史记》《汉书》比较与文献研究、《史记》史事研究、《史记》人物研究、《史记》文学与语言研究、《史记》写人艺术研究、学术动态报道等方面的内容，全面展示了“司马迁与《史记》研究”栏目 20 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凡入选论文的作者，在署名下括注该论文发表时作者所在单位，以保持原貌。职务、职称、简介等项省略。为奖励后进，学生论文标明作者身份。

作 者 简 介

本书选编作者王炳社、詹歆睿、王双喜。王炳社，渭南师范学院期刊管理中心主任、教授。詹歆睿，期刊管理中心副主任、副编审。王双喜，渭南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目 录

《史记》人物研究

- 《史记》与中国古典传记 张新科 3
从《史记》和《左传》春秋霸主形象的比较
 看司马迁的创作 朱志纯 32
英布其人
 ——司马迁与尚仲贤的论赞及其他 吴莺莺 41
试析项羽复杂性格 何梅琴 51
十六诸侯世家论析 杨燕起 62
《史记》人物附传论 肖振宇 78
从《战国策》与《史记》看苏秦与张仪
..... 李军 刘延琴 92
自残：论《史记》人物的生死抉择
..... [马来西亚] 郑诗傧 99
论《史记》屈贾合传的原因 杨德春 106

1

《史记》写人艺术研究

- 《史记》写人际关系 徐兴海 117
“然诺”辨 常昭 常青 128
从关注“为人”到“心灵”大师
 ——司马迁对人心人性的探究 可永雪 134
简论《史记》中的女性人物 王晓红 147
浅析《史记·项羽本纪》中的情态描写 李娜 160
《史记》多哭论 林立坤 168
《史记》的“怨”、“愤”与“实录” 李征宇 188
“阴谋修德以倾商政”
 ——《史记》对太公形象的再塑造 陈金霞 195

“发愤著书”说在唐宋时期的新发展	马雅琴	王麦巧	204
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心理美学内涵探析	王长顺		211
王逸《楚辞章句》对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因革	雷炳锋		218
项羽文化的理论建构与内涵阐释	杨宁宁		225

《史记》文学与语言研究

试谈《史记》“太史公曰”的文学特色	王增文		247
《史记》的辩证艺术	何旭光		256
《史记》与我国古代小说	韩兆琦		266
论司马迁解读屈原悲剧的文化视角	陈立强		285
也谈《史记》的悲剧性	余斯勇		294
论《史记》之奇美	王渭清		301
《史记》中的赋话与赋论	刘伟生		310
论《史记》中的“梦”	文晓华		320
历代项羽诗颂及其精神意蕴	马宝记		328
《文心雕龙》对《史记》的引叙和融摄	高林广		340
论京剧“史记戏”对《史记》的改写	俞樟华	郭玲玉	351
《史记·五帝本纪》中司马迁的主体性构建	徐军义		363
《史记》与汉代语言及关中方言	朱正义		376
《史记》中所见的关中方言词语	曹 强	田晓荣	396
《史记》同素同义单双音节动词浅论	朱成华		407
略谈《史记·列传》的反问	王麦巧		417

《史》《汉》比较与文献研究

略论马班异同的内容与发展历史	张大可		429
从《汉书》对《史记》材料的挪置比较			
马班的叙事手法	沙志利		444
《史》《汉》类传比义	李 峰		452
《史》《汉》疏密论	曾小霞		463
《史记》《汉书》诸《表》考订	吴昱昊		472

宋人对《史记》和《汉书》中晁错形象的接受

——兼论晁错之死因	罗昌繁	489
出土文献在《史记》研究中的文献学价值	苏安国	500
《洪范》晚出新证	牛鸿恩	511
《史记》成书的主客观条件	段永升	527

学术动态报道

唐代《史记》传播研究综述	耿文风	545		
近十年司马迁思想研究				
综述(1997—2006)	卜超	金家诗	王琳琳	557
近十年来《史记》人物研究综述	单瑞永	金家诗	569	
近十年《史记》女性形象研究综述	姜和	581		

史记“名栏”建设研讨

做好《史记》选本研究与整理工作			
——“《史记》选本丛书”序言	张岂之	599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栏目的			
建设与发展	党大恩	詹歆睿	604
《渭南师范学院学报》“司马迁与《史记》研究”			
栏目述评(2001—2012年)			
——纪念“司马迁与《史记》研究”			
栏目开办100期	岳慧	尚园园	609

《史记》人物研究

《史记》与中国古典传记

张新科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史记》的出现，开辟了中国古典传记文学的新纪元，并对中国古典传记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史记》以前传记的发展

传记文学是人类生命的一种载体，它真实地记录了人类的社会实践，记录了人类生命的存在与发展，记录了人类生命的伟大与渺小、可贵与可恶、真善美与假恶丑。传记文学最大的特点是写人，写人一生的事迹或一生中最主要的经历。在《史记》以前，虽然没有以写人为中心的传记著作，但有许多典籍如《左传》、《战国策》等，对于《史记》写人起了积极的作用。因此，我们要认识《史记》人物传记的成就与贡献，就必须对它出现之前的传记情况进行一番回顾。《史记》出现之前的传记发展，可以说经过了三个阶段，由神到人、由上层人到下层人、由人的外部行动深入到人的内心世界。

1. 艰难的起步：由神殿迈入人间

恩格斯指出：“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① 有历史并不等于有传记、有史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类还不能用文字来记录历史、记载人物。对于历史的认识，是处于混沌状态；对于自身价值的认识，几乎等于零。“野蛮人由于没有力量同大自然搏斗，而产生对上帝、魔鬼、奇迹等信仰。”^② 他们把一切归之于神通广大的主宰整个宇宙的上帝，使神人化，神话就是历史，神话就是口头传记。“神话即历史”，这是一种有过广泛影响的神话学说。它是公元前四世纪希腊无神论哲学家尤赫墨洛斯命名的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诸神是神化了的历史人物。古代君王或者自封为神，或者被尊奉为神，并因此而建立宗教仪式。所以神话中必然含有史迹，甚至就是某些历史事件的反映。虽然它那幼稚的唯理主义对大多数神话都未能完满地作出解释，尤其是对各种宗教仪式更未能提供说明，但作为对前人精神物的一种理解，仍是值得肯定的。马克思揭示了神话的本质，指出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③ 每个民族在自己的童年时代，都产生过许多优美的神话。如中国的“女娲补天”“夸父追日”“黄帝战蚩尤”等都具有一定的故事性，神是作为被描述的对象。我们的传记文学正是孕育在这些既有故事性又有描述对象的神话之中。

传说是神话的演进，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人们相传、叙述的事迹逐渐接近现实生活，相传、叙述的人物逐渐接近现实的人。鲁迅曾说：“追神话演进，则为中枢者渐近于人性，凡所叙述，今谓之传说。传说之所道，或为神性之人，或为古英雄。”^④ 许多传说都有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的缘由，却又并非历史的实情，象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尧舜禅让等等，人们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7页。

② 《列宁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3页。

④ 《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8页。

把自己生命的美好愿望寄托在这些神性之人或古英雄身上，以求得他们的保护。而作为传记文学来说，已经跃跃欲试，即将诞生了。

文字的产生，表明人类进入了文明社会。中国最早的文字是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刻甲骨的贞人就是最初的史官，也是最初的传记家。其职责是沟通神与王的意志，这是一种宗教活动。甲骨卜辞仅是历史记载的萌芽，其中迷信成分相当浓厚，人是神的附庸，神支配着人的一切行动。在人的生命意识中，神是自己生命的主宰，生死祸福全由至高无上的神掌握。甲骨卜辞还不能算是传记文，它只是作为求神问卦的工具而已，还没有成为历史和传记。

诞生在周代的几首民族史诗，才是中国传记文学的真正的源头。《诗经·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五首诗歌，反映了周族历史的发展进程，他们所记的人物基本上是真实的，而且程度不等地具有传记的某些特征。《生民》记述了周族始祖后稷的事迹，虽有一些神奇色彩，如诞生之奇、弃而不死之奇，但重点还是描述他发明农业的功绩，是当时的现实生活。《公刘》一诗主要写公刘带领周人由邵迁豳的壮举，神化色彩已经消失了，而是代之以真实的人的生活，《绵》、《皇矣》、《大明》三篇写古公亶父迁岐、文王伐崇伐密、武王伐纣等事件，更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因此，陆侃如、冯沅君在《中国诗史》中称之为“后稷传”“公刘传”“公亶父传”“文王传”“武王传”；白寿彝先生在《史记新论》中也说《生民》、《公刘》“这两篇是歌颂古代英雄的传说，是传记体”。这五首歌虽是文学作品，但却具有历史的价值，是中国古典传记的源头所在。当然。这个源头的出现不只是一种体裁的诞生，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周人思想的一个转变，生命意识的转变。因为它是把人作为描绘的对象。已经从神秘的空气中游离出来，带有一种“革命”的意义。这种转变，我们还可以从其他文献中找到例证。在西周初年，人们对天命的认识已经由殷商时的“敬天信神”发展到“敬天保民”，进而发展到怀疑天命，正因此，一他们把人间的祸乱皆归之

于人事之不善，并非上天作祸。《诗经·大雅·瞻昂》：“乱匪（非）降自天，生自妇人”；《小雅·十月之交》、“下民之孽，非降之天”。尽管对于人的观念突破是在战国时代，但周代出现的这种变化也是不可忽视的。

春秋时代，在历史记载方面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是编年体史书《春秋》。它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十四年二百多年间各国的历史。诚然，它记事十分简单，属大事年表性质，但在史书记载方面有它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一方面它记载了一些灾异迷信之事，而另一方面则把人放到了一定的位置，人事占主要成分；虽然它是“断烂朝报”，看不出事件发生、发展的必然联系，但它毕竟写出了事件中的人。在人的心目中，事情的发生是由人支配的而不是由神，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变化，虽然《春秋》不是传记，但它在传记发展史上却有重要意义，它的出现，把神与人的位置打了一个颠倒，把人放在了主导地位，这给后面的《国语》《左传》以人为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象《左传》这样的著作在史传发展史上颇有重要意义，应该说是受惠于《春秋》的沾溉。这就是传记文学历史轨迹中的第一个重要步骤，如果不把人作为主导的因素去描述，那么，传记文学永远不会有新突破。

2. 可喜的进程：人的群体的增大

传记文学刚刚迈出的第一步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我们不难看出，这些史传中所出现的人，都是上层人物，人的范围还相当狭小，有待于进一步的发展。传记文学中的群体的增大，不仅是传记文学本身的问题，它与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密切关系。随着人在社会历史中价值的被认识、肯定，越来越多的不同阶层的人都逐渐进入传记行列。

春秋战国时代，是人们价值观念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最突出的就是人的价值被逐渐认识，人的生命意识逐步改观，我们可以从工艺品中找到极好的例证，如春秋晚期的“莲鹤方壶”，郭沫若先生在《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中对此有段精彩的论述：“此壶全身均浓重奇诡之传统花纹，予人以无名之压迫，几可窒

息。乃于壶盖之周骈列莲瓣二层，以植物为图案，器在秦汉以前者，已为余所仅见之一例。而于莲瓣之中央复立一清新俊逸之白鹤，翔其双翅，单其一足，微隙其喙作欲鸣之状，余谓此乃时代精神之一象征也。此鹤初突破上古时代之鸿蒙，正踌躇满志，眼睨一切，践踏传统于其脚下，而欲作更高更远之飞翔。此正春秋初年，由殷商半神话脱出时一切社会情形及精神文化之一如实表现。”当时，郑子产喊出了“天道远，人道迩”（《左传·昭公十八年》）的时代强音，孔子也有“问人不问马”（《论语·乡党》）的大胆举动，这些与殷商时期天支配人、马比人贵（“匹马束丝”可以换取五名奴隶）形成鲜明的对比。同时，孔子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的对个体人格的追求，也体现出人的尊严。到孟子，更是追求一种“大丈夫”式的崇高人格，以至升华到最高阶段——“舍生取义”。孟子还提倡人们之间应该互相尊重，“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对残民的君主大加指斥，称桀纣为“一夫”。庄子也在追求人格的独立，“无君无上，无臣于下”（《庄子·至乐》）是他的理想，他要跳出各种樊篱，摆脱各种束缚，展开双翅，自由飞翔。荀子在当时提出“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的思想更具有进步意义，把人突出到相当重要的地位。以上所举，旨在说明春秋战国时代人的地位明显提高。正因此随之而起的史传文学，也已注意到了人的力，人的活动。继《春秋》后，《左传》首先在写人方面取得成就，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贡献，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给予很高评价：“左丘可谓商周以来史界之革命也，又秦汉以降史界祧之大宗也。”虽然“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但从整个《左传》看，主要载是“戎”，也就是人，不难发现，即使象占卜迷信之类的成分在《左传》中依然存在，有时甚至于事件的发展、人物的活动有一定的影响作用，但人的成分始终占主导地位，这在写人方面一个很大的进步，体现了从神到人的一个重要转变过程，在人的类型方面，它大大超过了前代的历史记载，《左传》中出现的人物，不只是前代历史记载中仅有的那些

天子诸侯，众多的小人物也登上了政治历史舞台，从周天子到诸侯王，从诸侯王到卿大夫、到外交家、商人，甚至于妇人，形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在这里可以看到大千世界的缩影。而且，《左传》已经刻画了许多形象较为鲜明的人物。如晋文公、秦穆公、楚灵王、郑子产、晏婴等，这在以前史籍中不曾有过。《左传》的出现，给史传文学带来了生机。

战国时代，是一个巨变的时代，出现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士，这一阶层特别活跃，成分也比较复杂，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中把它划分为四种类型：掌士、策士、方士或术士、食客。最能体现这些人（尤其是策士、食客）纷繁活动的史传是《战国策》。它的产生，又把史传文学向前推进了一步。人物的类型更丰富，小人物也更多。在这些人物画廊中，上有“年九十余”的白发老人唐且，下有“年方十二”的鬌令稚子甘罗。有朝秦暮楚、到处游说的政客（苏秦、张仪之流），也有不畏强暴的高义之士（鲁仲连等人），既有以养士出名的贵族公子，也有鸡鸣狗盗、引车卖浆之徒，还有那些嬖臣宠姬，充分体现了战国时代的特征。而且，《战国策》已经向以人为主、以人明史方面过渡，有些篇章明显地是在写人，尤其是《燕策三》写荆轲刺秦王之事，激昂悲壮，淋漓酣畅，是一篇出色的传记文学作品，荆轲的“就车而去，终已不顾”，“倚柱而笑，箕踞以骂”，田光的自刎而死，樊於期的慨然自杀，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战国策》的写人是由编年体写人到纪传体写人的一个桥梁，在史传文学发展中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战国时代的诸子散文，虽然“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大本”，^①但总要记载该学派奠基人的言行事迹，并旁及其弟子或辩论对象的言和行，因此，诸子著作也具有一定的传记因素，而且扩大了传记中人物的类型。《论语》是孔子的言行集，有些篇章已经写出了人物的音容笑貌，如《微子》篇中的“侍坐”章，通过孔子和他弟子的谈话，刻画出他们各自的性格特征，尤其是

^① 萧统：《文选·序》。